本版编辑：熊若愚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389

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建构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形成了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 王明泉

任何完整的思想体系，都必然有内在的建构逻辑。对逻辑的揭示，既体现了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一种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的内在轨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治国理政新实践的层层展开和步步推进，必然有一系列的理论逻辑做强大支撑。揭示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是一项高度抽象的工作，完成这一工作离不开对有重大指向意义、高度凝练的关键词的梳理与把握。那些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并经党的最高会议确定的深度体现党的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大关键词，是展示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本质内涵、演进轨迹和基本理论逻辑建构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梦，是体系架构中肇始性、统摄性的重大关键词，是指导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实践的理论逻辑起点。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符号和使命，中国梦的提出，契合时代特征，昭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它的真正含义不是要重复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的鼎盛时期，而是实现更有尊严、更有地位、更有重大贡献和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状态。“中国梦”大气恢弘、光明伟岸，像一只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打开了治国理政新实践极为重要的一个窗口，成为时下中国发展最澎湃的动力，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新篇章必有新思路，新思路必然引发新实践。两个“姊妹篇”是为实现中国梦确立的“车之双轮”和“鸟之两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一直被称为“姊妹篇”，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确定了十八大后治国理政新实践究竟要“干什么”；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则明确了“怎么干”。把“干什么”和“怎么干”两个方面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从内容与方法两个维度，使之须臾不离，协调推进，既是一项科学的制度安排，也是我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科学证明，列车运行，高鸟飞翔，单轮单翅是无法维系的，双轮双翼才是可靠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两个“决定”以及体现两个“决定”精神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共同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是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基本经验的一个必然结论和必然逻辑，更为深化改革取得成功，避免出现颠覆性失误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制度保障。

两个《决定》为实现中国梦插上了“两翼”，配置了“双轮”，“三严三实”则对实现中国梦的领导力量提出了明确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干什么”和“怎么干”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具体要求，紧扣时代特点和时代任务，明确而不含糊，具体而不抽象，朴实而不浮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是当前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键环节。“三严三实”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新型政党作风和政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石，为2014年10月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前奏。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对一个中国梦、两个“姊妹篇”、“三严三实”的进一步总结和升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词是“全面”，落脚点是“布局”。用“全面”二字界定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四个领域，回答了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布局结构、任务使命，以及怎样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其含义深刻，眼界高远，布局缜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运思谋篇赢得了战略先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前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把“三严三实”的治党要求上升为完整的治党理论，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政治保证。在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上，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既有具体途径又有具体保证，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至此，中国社会一个崭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图景已经基本成型。

新发展理念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我国社会发展方向和方式上的思想保障。“四个全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和政治框架，它最终要靠发展来体现，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更好地发展。在发展的实质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仍需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不能含糊和犹豫，必须提出科学而具体的发展理念，以统摄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发展需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既是对我国30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发展问题上的延伸和拓展，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丰富和完善。它具体回答了我国社会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秉持怎样的发展理念以及怎样发展的大问题，和“四个全面”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和建设框架。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规律性认识。其一，十八大后治国理政新实践已经形成了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从中国梦到新发展理念，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清晰、更完善。它们不仅各有其确定的内容，而且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形成了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系，成为十八大后体现党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精髓。其二，治国理政新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站在新的历史潮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形成了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治国理政新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涵，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新体现和新拓展。

新思想新实践

政治学话语体系亟需中国化

□ 陈雪莲

在全球化时代，自说自话的文明已难有生存空间。如何在保持民族性同时实现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发展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给哲学社会科学带来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中国化和国际化缺一不可。

概念通常被看作是对事物的一般性本质特征的把握，它是从感性事物的共同特点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政治概念则是对政治事务的一般性概括，是我们进行政治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它对学科发展和政治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学概念，需要对政治现实及其发展规律具有解释力。中国政治学概念应当从中国的政治现实出发，构筑可以解释不同国别、不同区域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理论。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概念对现实的解释力是落后于政治发展需要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步于译介，即政治学的国际化占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发展主要以翻译引入西方政治学概念和理论为主。译介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和前沿动态是1980年代政治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工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补遗、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等译介图书，集中反映了国内学界对政治学国际化的追踪和热情。

译介繁荣的背后是，中国政治学学者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议题也是由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长期受外来思潮和范式的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落后于实际、政治学概念本土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也与发展起点有关。相当时期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存在这两种倾向，一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二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文本去评判中国的现实发展。

然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基本不讨论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中国学者也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进入21世纪，中国政治学学者在关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讨论中提出了“政治学本土化”命题，进入反思和独立建设阶段。从2005年开始，学界开始较为密集的本土化建设路径的讨论。在过去10年内，中国政治学界从中国现实出发，批判吸收西方政治学概念中适用中国现实的部分，提出了压力型体制、增量民主、差序政府信任等一系列本土化政治学概念。但是实现政治学本土化还仅仅停留在讨论中。有学者统计了CSSCI收录的政治学文献，分析发现：在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中，大部分都是外文论文。这表明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程度还非常低。目前，理论界对中国的政治学概念应该使用西方政治学概念以提高对话能力还是应以本土化为主以提高现实解释力仍存有争议。

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发展以该国的政治发展为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赋予中国学界构建本土政治学话语的土壤和根基，让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了“道路自信”，也给了中国政治学概念本土化以“文化自信”。本土化政治学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使用国际通用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进行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构建，以提高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现实的理论解释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前提是“以我为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当代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具有国际视野，以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专家视点

可为·可不为·不可为

□ 徐文秀

大有笔潭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次换届，一批“新官”将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上任伊始都自然会思考“干什么”“怎么干”，谋划自己的“三把火”。然而，这“火”该烧什么、怎么烧，哪些事情可为或可不为或不可为，无论是“新官”还是“旧官”，都应该想清楚、弄明白。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三圈理论，它构建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要素分析框架，三要素分别代表三个圈，三圈全部重叠的那部分，属于既有价值又有能力，并且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事，这样的事可为；只有两圈重叠的那部分，则可不为，或可以暂时不为；而三圈根本不交叉重叠的那部分，则属于不可为的事。三圈理论给了我们颇多启示。

可为之事当全力去做，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在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情当中，哪些事是可为之事？不少干部未必搞得很清楚，而有些干部虽然搞清楚了却不愿、不敢和不善作为。现实中，有的热衷于做一些显山露水、“贴金露脸”的事，对老百姓呼声高、诉求大的民生实事提不起劲、来不了神，甚至对老百姓急着等米下锅的事，竟然“你急他不急”，好比大象屁股推不动；有的计较于自身的利益得失，对那些利长远、动筋骨的改革创新，缺乏动力、不感兴趣，“一等二看三通过”，甚至或明或暗地“软抵制”；有的满足于喊口号、提理念，对那些“深水静流”悄无声息诸如环保、生态建设等事情不冷不热，等等。干部、干部，干事为第一要务；干部、干部，干事才有进步。要干事，就得全力去干那些既有意义，又有能力，并且得到最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拥护的事。没有意义的事不必做，没能力办到的事无法做，得不到最广泛支持的事做不成，只有这三个要素都具备了才真正可为，并且要既坐诊又号脉、既出工又出力，在有为中有位。

可不为之事当量力去做，这是一种清醒和自觉。孟子有句名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范晔在《后汉书》中说：“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世上之事，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为或一时不为并非不能为，实乃一时的条件不成熟、不具备，倘若硬着头皮勉强为之，则必定事与愿违或事倍功半。这些年，一些地方接连不断出现被群众叫停的PX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可不为的一些道理。有的人总是片面地认为只要“有价值”又“有能力”就可以脑袋一拍干起来，不管也不顾群众的意愿，还美其名曰：看准了就干。有的虽然老百姓有需要，客观上也有必要，但自身条件不够，能力有限，却迷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搞“霸王上弓”，盲目蛮干、硬干，结果造就了不少“僵尸项目”“烂尾工程”等等。做事情，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或只顾一厢情愿，有时候，有些事情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和不到位时，不妨暂且缓一缓，不可操之过急，有时“慢下来”也不失为一种良策。要“跳起来摘桃子”，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特别是要关注最广大老百姓的哭与笑，这是可为与可不为的“指挥棒”。

不可为之事当坚决不做，这是一种意志和定力。作为党的干部，不可为的事很多，从大的来说，违背党的主张、触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等底线的言行都是毫不含糊决不可以为的事，这里的不可为主要是就做事而言。没价值去做、无能力去办、群众又不支持去干，这“三者”都不沾边的事自然不可为。然而，这简单明摆的道理，在有些人眼里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的信奉“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于是一味在GDP等数字上做文章、“玩游戏”；有的好大喜功，迷恋“面子工程”“马路经济”，于是热热闹闹搞“造城运动”；有的热衷打造个人威望、树个人形象，于是今天提个这口号，明天换那个口号，搞张书记种树、李书记砍树，还炮制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概念，等等。这些事情既没任何意义和价值，又让老百姓反感和厌恶，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不可为之事，重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名利观和政绩观，学会算大账而不是一味算小账、看长远而不是一味看眼前、装着群众而不是一味装着自我，这样，心里头才会亮堂，才不会不可为而为之。

为官从政，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心里有谱、脑里有弦，想清楚、弄明白，哪些事可为，哪些事可不为，哪些事不可为。可为之事全力做、可不为之事量力做、不可为之事决不做，这是当下难能可贵的一种清醒和自觉。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种意涵

□ 汪信砚

为什么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怎么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涵。

“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种意涵。一种是直观意义上的或常识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讲授中国语言文化，把中国的各种文化产品翻译为他国文字，派遣各类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出国访问和交流等等，就是在推动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认识和熟悉中国文化。另一种是深层意义上的或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往。理解和接纳一种文化，关键就在于理解和接纳它的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

显然，这两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其中，第二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建立在第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上，因为任何人只有首先认识和熟悉一种文化，才可能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但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必然会带来第二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因为人们认识和熟悉一种文化，并不一定会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

所谓理解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就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文化交往中的价值共识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价值认同，即一种文化中的人们认可、赞同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并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二是价值认异，即人们在认识和熟悉了一种文化后，虽然并不认可、赞同和接受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基于相互之间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势的差异能够理解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产生和存在的理由或根据，承认它的合理性，并由此尊重它。

我们说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显然，这里所说的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我们也不要指望是价值认同，而只能是价值认异，也就是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尊重和包容中国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崛起中的中国人的全球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明确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涵，我们方可讨论怎样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文化建设，着力塑造中国文化的形象。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什么？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中国的价值观念又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多也只能实现第一种意义上的“走出去”；即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表示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实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走出去”，因为它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当代中国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这种文化目前仍然是有待于我们大力加强建设的，它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有待于内化为全体中国人的自觉追求。只有从内到外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我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其次，要正确理解和科学定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人们通常把“中国文化走出去”视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性举措，并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就是要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那么，什么叫作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呢？有人认为，就是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热爱和信奉中国文化。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定位于价值认同，因为真正热爱和信奉一种文化，必定会认同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我认为，这种理解和目标定位是不恰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只能定位于价值认异；而所谓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只能理解为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真诚地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

再次，要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如前所述，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层次。目前，人们所做的工作大多属于第一种意义、第一个层次上的“走出去”的工作。虽然这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需要提升，与“中国制造”需要升级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而要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实现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首先必须生产出、打造出大量真正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化精品，并大力加强对这些文化精品的世界性传播。

理论研究